

“中国农村研究”与“东亚农村研究”

张玉林

(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)



2010年盛夏,京都大学的几位年轻学人在平田昌司教授的带领下,来到南京实施作为“中国研究短期集中项目”的中国农村调查。出于对京大在中国研究方面的一种有意识转向——从只注重传统的“汉学”到关注巨变中的中国?——的感佩,我和南大的几位学子也积极地参与了这项活动。并向他们推荐了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村庄:工业化程度较高、涌入大量外来人口的吴江市开弦弓村,以及位于大都市远郊、人口外出-外迁较多的南京市江宁区青龙村。

京大同仁们的兴趣在于“探索中国农村研究的方式”,通过实地调查来研究“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”,查明“农村居民会以何种形式何种理由,在农村内部以及与外界进行结合”。现在,他们提出了初步的调查报告,嘱我写一些感想。我的确是“感慨无量”,但因篇幅上的限制,这里仅略述两点,以尽续貂之责。

第一,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,京大同仁们的关注点应该说对于中国的同行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。在一个人心的流动和人身的流动都异常剧烈的时代,当村庄从极端封闭走向高度“开放”和“外泄”,从“熟人社会”逐步变成“陌生人的社会”,探讨社会“结合”的因缘、形式和可能性,无论是从学术的角度重新担负起社会学的原初使命,还是从实践的角度(在陌生人的社会重建“信任”及“和谐”)尽力于社会学者的应有职责,这都是一个重大命题,不仅难以回避,而且理应首选。

第二,同样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,“中国农村研究”似乎已经很难再孤立地存续,或者即便能够存续也很难有所突破。就浅见而言,“中国农村”虽然因制度、文化的影响而呈现一定的独特性,但其实与日本、韩国,以及台湾地区的农村有着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。概而言之,尽管各个政治体都曾经和正在实施不同形式的“农村建设”计划,但东亚农村的衰落、凋敝、分崩离析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,而且仍在加速。“过疏化”(空洞化)、“界限集落”、“留守儿童”、“独居老人”,乃至“新娘不足”等等现象,都昭示了“东亚小农圈”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痛楚。而在东亚农村走向解体和崩溃的背后,蕴藏着一个异常明显但并没有受到整体性重视的巨大尴尬:从食物供应或“谷物自给”的角度而言,东亚农村已经无法养活东亚的人民。这实际上可以看作一种文明——“东亚资本主义”以及“中国式的资本主义”——的危机。这种危机不仅是所谓“东亚的奇迹”的巨大代价,也是对它的巨大嘲弄。

如何面对“中国农村”的独特性和“东亚农村”的共同性?我很认同报告执笔者中山大将先生的主张:“农村研究者所关注的(事象)不应被地域的边界所分隔”。为了避免只见树木、不见森林的危险,有必要在比较研究和类型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整合研究——“东亚农村研究”——。这需要东亚的同行一道来进行集体性的反思、自觉和努力。

农历2010年岁末于南京